



最新图文版

SHIHUA SHISHUO
FENGZEYUAN

下册

李静 主编 师哲 等著

实话实说 车泽园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丰泽园 实话实说

SHIHUA SHISHUO
FENGZEYUAN

李静 主编
师哲 等著

下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三章

风起云涌在庐山



庐山，这个在共和国历史上有着特殊位置的名胜景点，它不仅以风光秀美闻名天下，更以庐山会议而著称。在这里，庐山云雾已经不再是一个气象术语，而是打上了神秘的政治含义。在这个山上发生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浓缩了一代伟人的悲欢离合——敢于直言上书的彭德怀在此山落马，林彪因此攀上权力高峰；毛主席唯一一次会见战争年代的妻子也是在此山的怀抱中……直到1970年，庐山再次成为众目聚焦的地方，林彪在此山完成了高升、得意、失宠和跌落的全过程。

✧ 陶鲁笳说 ✧

纠正高指标过程中，钢、粮指标能否完成，领导层中产生了分歧。“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嘛。”毛主席一锤定音。

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党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毛主席主持下，把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主要是钢铁指标，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

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曾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1月上旬，陈云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在这次上海会议开头，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的生产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公布



✧ 为了实现高指标的任务，全国各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脚步。（历史照片）

的：钢 2000 万吨，粮 10500 亿斤，而且事先没有同各省、市、区商量，就在大会上宣布各省、市、区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

我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因为大多数省、市、区的同志都感到指标过高，但又不便明确表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成为当时人们的精神动力。（历史照片）

态，有些同志只是语焉不详地讲了讲完成本地区任务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当时在主席台上的除有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大区中央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等，他们用一个腔调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既定的指标。我还记得李井泉说，你们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 斤红薯折一斤粮）。柯庆施也说，你们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

他们这样一说，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不接受吧，似乎有右倾之嫌；接受吧，又确有难处。这种情形为中央领导同志所察觉，所以在散会后，部分中央同志便分头到各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例如，说服我要山西完成钢 100 万~120 万吨，如确有困难，可以仍按 1958 年那样，再完成 20 万吨土钢来补足；完成粮 180 亿~220 亿斤，如确有困难也可多种红薯来补足。

我通过电话同在家的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 1958 年实产钢 42 万吨，粮食实产也只有 92 亿斤，1959 年钢、粮指标定得那么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都主张建议中央把指标降下来。在会内我接触到的一些其他省的领导同志都有同感。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一天，毛主席召集六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

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主席的对面。由于我对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毛主席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



李井泉(前左三)陪同毛泽东在四川视察。(历史照片)



毛泽东在曾希圣(右一)的陪同下视察安庆市第一中学。(历史照片)

这时我才知道，饭前开的座谈会已讨论过指标问题，任重也不同意这样高的指标。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这时李井泉对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我对李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

曾希圣又帮腔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我对曾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

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看到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同志也以大话空话压人，王任重也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最后，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钢产指标由 2000 万吨，调整为 1650 万吨，粮食指标未动，仍然为 10500 亿斤。我背回的中央分给山西的指标，钢降为 83 万吨，粮仍然是 180 亿~220 亿斤。

八届七中全会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七中全会决定的钢、粮计划指标能否实现仍在继续考虑之中。5 月 3 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书记处的指示，在陈云主持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调整钢产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中央政治局很快开会讨论并同意了陈云关于把 1959 年的钢产指标调整为 1300 万吨的意见。会后陈云针对有些同志不同意调整指标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是否一定会泄气，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6 月 15 日，毛主席在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毛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 1959 年的钢产指标为 1300 万吨。当年实际完成 1365 万吨。

现在回头来看，1959 年的钢产指标由 1958 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 3000 万吨，武昌会议降为 2000 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 1650 万吨，最后降为 1300 万吨，才比较接近实际，做到实事求是，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多么不易啊！且还应当看到，1959 年全国钢产指标的超额完成是在“一马当先”、“全民保钢”的条件下实现的。就钢本身来说是个胜利，但就国民经济全局来说，却有失



1981 年 7 月 2 日，陈云同志在怀仁堂向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的同志讲话。（杜修贤摄）

误的一面。它破坏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而钢本身也好景不长，在 1961 年后连续 9 年钢的产量都低于 1959 年的实际水平，最低的一年只有 667 万吨。

不切实际的粮食指标何以居高不下？毛主席检讨说：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更为严重的是粮食指标居高不下。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确定 1959 年的粮食计划指标 10500 亿斤。1959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指标。

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来自既然钢产量能翻一番，粮食产量也应该和可能翻一番的主观臆断；它来自对 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6000 亿~7000 亿斤，1959 年 5 月对 1958 年的粮食产量重新估产为 5500 亿斤（实际只有 4000 亿斤），照此数字翻一番，就得出了 1959 年计划产粮 10500 亿斤这个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它还来自要提前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到 1972 年粮食产量实现 7200 亿斤的要求。

所以，在钢产计划指标调整到比较接近实际时，粮食计划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尽管毛主席在 1959 年 4 月 29 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向全党发出的五封《党内通信》中，反复严厉批评了说假话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并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但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没有进行调整。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 8 月 2 日在会上说，上海会议时有同志主张改指标，看来，那时改是困难的。现在要改，变被动为主动。这次会议才把粮食计划指标由 10500 亿斤调整为 5500 亿斤。尽管调整幅度如此之大，结果，和这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截然相反，1959 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 3400 亿斤。1959 年、1960 年和 1961 年，农业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当然，三年自然灾害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农业连续减产，使工业产量被迫下降，国民经济遭受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挫折，人民吃穿的基本需求发生了始料不及的难以想象

的困难，迫使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大调整。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

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四年中，开始两年的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是偏高的、不切合实际的，直到1963年粮食计划指标定为3186亿斤，实际完成3400亿斤，计划同实际才比较一致起来。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体会到，高指标问题给予我们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毛主席在没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主观认识逐步接近实际，对如何搞好计划工作，讲了许多精辟的、对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的意见，现在我摘要列举如下：

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在开头的讲话中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次序。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



☞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图为毛泽东在农村视察粮食生产情况。（历史照片）

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钢的计划产量指标一变少，其他都跟着削减，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要改变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国防需要。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1959年毛主席还说过，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能用计划来调节，只能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就是说经过破坏，然后调节。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和可能用计划来调节，也有必要和可能在制定计划时自觉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计划本身是主观的，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要善于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比例关系遭受破坏之前预先调整计划。

1959年毛主席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了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规模60万吨钢，100万吨铁，五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120万吨钢，200万吨铁，时间两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已提出要改变计划管得太死，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见解了。

1960年6月18日上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讲话中就计划和指标问题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到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对此指标很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次会议讲了很多要谋善断。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召开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

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一样，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毛主席多次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余地留得大一些好。在《十年总结》中，他说，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补充计划，仍然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总理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还作了自我批评，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如此等等。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公开改正……”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毛主席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他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在当天下午的会上，毛主席说他写《十年总结》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现在重温毛主席所讲的这段来自实践的理论概括，使我们仍然感到很亲切，并且感到获得主动权不仅对计划工作如此重要，对其他一切工作也都一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久久萦回在脑子里的问题：为什么纠正高指标这个脱离国情、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我们党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精力，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

客观地说，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首先发现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其中包括高指标错误的是毛主席。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

议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三年多时间里，毛主席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尽管中间经过曲折和反复，总的看，他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表现了一位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者的风采。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1960年6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说，订计划要留有余地，指标低一点，努力争取超过，有什么不好！同时又说，今年的钢产量要超过1840万吨，能超过1吨也好，现在看完成2100万吨有希望。实际上当年钢产量只有1866万吨。这正是毛主席这种矛盾心理状态的一次流露。我个人认为，毛主席这种矛盾的心理同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有关。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通过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公之于世。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这就是“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因而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尽管后来纠正高指标的错误做了那么多艰苦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这只能看作是战术上的胜利。而在战略决策错误的情况下，战术胜利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欲速不达的被动局面。根本的历史教训，在于不顾国情国力而急于求成，这是值得我们全党永远记取的。

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说过：“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就认识和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来说，毛主席正是善于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从自己错误中学习的榜样。例如，大跃进中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把钢看作统率国民经济的“元帅”，要“元帅升帐”，其他方面都要为它让路，结果出现了一马当先、万马齐喑的局面。实际上钢产量多少并不会全面反映综合国力的强弱。苏联的钢产量早已超过美国，但它的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却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错误，在1960年上海会议上说，过去想搞一亿吨钢，不一定。现在搞三千、四千、五千、六千万吨，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品种全，规格高，要有特殊钢，要样样都有，使五六千万吨钢顶一亿吨用。30年前毛主席从错误中悟出的这个道理，对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作者：陶鲁笏，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大家畅所欲言，好似欢乐的神仙会。毛主席因为心情好，还张罗着要为身边的小伙子们找对象。

1959年6月29日，在九江的一个游船上，会聚了中国的各路诸侯——各大区、省市的负责人，中国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正在和他们开座谈会。这是庐山会议前的准备会。毛主席听了大家座谈汇报，归纳了19个问题。

按着毛主席原来的打算，庐山会议和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等一样，属于解决前进中问题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改正“左”的错误。

29日的会议后，与会领导们便陆续上山了。刘少奇、朱德是6月30日上山，周总理是7月1日上山，陈云和邓小平、林彪因健康原因后来上山。

我记得毛主席是7月1日由九江上山的。在这之前我作为“打前站”的提前上山，和江西省委警卫处处长坐前卫车先到180号寓所。毛主席下车后与江西省领导杨尚奎握手问好。

他在杨尚奎陪同下上台阶，环视自己住的小楼。据介绍，这栋小楼蒋介石曾住过。因为这是个生地方，我们工作人员也很新奇，四处打量。进屋后大家便闲谈起来。这时毛主席的情绪非常好。他突然回头对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说：“我身边的小伙子看到了吧？你们这里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庐山会议旧址。(历史照片)

水静看了毛主席一眼，又扫了一下他身边的小伙子们，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那么精神。”

毛主席朝卫士封耀松说：“小封，找个江西老表好不好？”大伙起哄都说好，说得小封不好意思。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小封当时正在找对象，前不久谈了两个都因某种原因“吹”了。老人家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很关心的，同时也说明当时他的心情是很好的。

水静对这类问题当然是愿意帮忙的。她略微思考了一下就说：“你们187号楼的小郑和小舒都不错，是省医院的护士，这次能上山为领导服务都是选了又选的。”

李银桥也不示弱，帮着小封说话：“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的！”

主席像办了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高兴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在毛主席及其他同志帮助下，小封和小郑在会议期间真的接触了，而且谈得蛮“热”，后来真的成为夫妻了。

这天正好是建党38周年。大家都很高兴。晚上我和王荫清与当地同志组织了舞会，表演了小节目，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都参加了。

毛主席非常喜欢山水，尤其喜欢庐山。晚上，他和平常一样，思想反倒比白天更活跃。也许被庐山美丽的风景所陶醉，也许被满脑子的各种国内国际问题勾起了兴奋，他有些坐立不安，一会儿走走，一会儿停停，一会儿坐坐。原来毛主席产生了诗兴。

经过好一阵子的走动和吟哦，终于产生了一首伟大诗篇。这是一周内作的第二首诗，第一首是在韶山作的，时间是6月26日晚。这首七律是写庐山的：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首诗写作大背景是：1959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一定成果的一年，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在持续三年发生严重困难的起始的一年。其原因除了工作失误、自然灾害

外，还有当时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就是在上个月，苏联单方面宣布与中国议签的协议无效，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天还是党的生日，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没有被吓倒，也没被压倒。他“冷眼”向洋，没有把外国施加的压力放在眼中。他看到的仍然是国内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想到的仍然是新中国的新面貌。在他思想中的主旋律仍然是向前进。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自己也充满信心。

7月2日，召开了常委会（一说政治局扩大会），毛主席又和大家议论前边所说的19个问题。这次会，大家也是议论纷纷，意见不尽一致，但大家情绪还是好的。

7月3日，开始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得更细、更具体。情况仍然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会议之余，也很正常。有的爬山，有的游泳。毛主席本人也是这样。在会议期间他多次游泳。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很高兴。

当然，他更主要的还是在考虑问题。虽然我们对具体讨论情况和毛主席头脑中考虑的问题不可能知道，但从听到的看到的这些以及我们所处的氛围看，会议是比较正常的。毛主席思考的中心问题还是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我们工作人员当时的情绪也是正常的。记得毛主席写庐山的这首诗写完后，很快就传出来了，而且是连同在韶山作的那首一起传出来的。我们大家互相抄念，细品诗味。我在日记中记载，抄录这两首诗的时间是7月8日，从小田那里抄来的，并和秘书们核对过的。

总之，正如毛主席说的，这段时间的会是“神仙会”。

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了风波。平静被打破，从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可以判断出“风云突变”。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

7月13日，我值班。毛主席上午7点40分休息。孙勇对我说：“家骥，会议快结束了，我们该买点什么就快办吧。”



1958年12月，彭德怀在湖南省平江视察和调查研究，与群众促膝谈心。（历史照片）

我们正在议论“后事”时，突然彭德怀的警卫员来说：“彭总要见主席。”我说：“主席刚入睡。”在警卫员后边的彭德怀转身就走了。他的这一举动使我很震惊，因平时见面总要说几句话。这次他没说话，满脸不高兴。我想是不是“风云有变”。

各组讨论的情况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很具体，就感到比较正常，其实各组也不尽一样。据以后有的材料上说：彭德怀所在的西北组就更有些特殊性。据说彭德怀在小组会议谈了很多意见，而且严肃、认真、激动。他说：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

“把那些经验好生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也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包括毛主席在内。”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7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各组长会议上，总结讨论情况时，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与彭德怀说的不一致。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或淡下来。

7月14日上午，我去看了几处名胜，如仙人洞、花径、御碑亭、三宝树等，如果主席要看，好有个准备。

下午4时，毛主席说要游泳。但因游泳馆工作人员没有安排好，毛主席

没有按定的时间游泳。

下午他起床后看到桌子上放着彭德怀的一封信。他浏览了一下，当时并没有大惊小怪，认为是个意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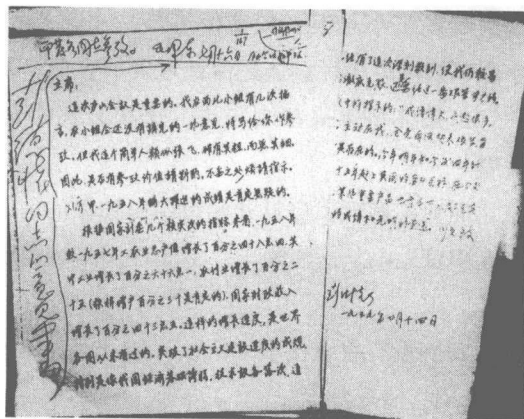
时间往后拖了一下，毛主席在卫士们陪同下还是游了泳。回来后，他对秘书说：“彭总尽给我消极材料。你看基层给我的就是积极材料。把这封信送给常委们传阅一下。”

据说7月16日，毛主席把刘少奇、周总理、朱德三位常委请来说：“昨天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他还说：“请彭真、陈毅、黄克诚、宋子文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

这封信据彭德怀自己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庐山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准备形成一个《纪要》发到全党。当时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特别是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还很不够。会议到后来也没有统一认识，出现两种意见：一是从实际出发，认为从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共产风”、大办食堂、实行供给制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另一种，把批评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说成是泼冷水、是右倾。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15日会议结束，便把自己在小组会上不便多谈的想法写在信中，想以毛主席的名义纠正当时存在的问题，这样效果能更好。14日，即会议结束的头一天他将信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为什么没有按计划在15日结束会议，我们不知道，也没听别人说过此事，也许看到会议没有统一认识，没有达到预想目的，加之，像彭德怀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又提出了意见，也许认为彭德怀这一举动以及会议前的认识与自己的认识相差太远了。

这封信在《彭德怀自述》以及有关文章中已公开，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指出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历史资料)